

要积极创造持续复苏的内外部条件

章玉贵

处于企稳回升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能否率先实现全面复苏,进而迈向均衡增长轨道,既需要通过结构调整以及相关配套改革来提升复苏的内生动力,也有赖于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善,更离不开业已失衡的内外经济的早日修复。

毫无疑问,尽管投入成本巨大,但是今年以来的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复苏道路上行走。而强劲的PMI数据表明,制造业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走强的主要动力。当然,近期的股市并不配合复苏预期以及通胀的可能抬头似乎预示着中国经济复苏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内生复苏动力不足

显然,与美国通过修复金融体系来走向复苏的路径不同,中国迫切需要刺激的是因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实体经济。从过往经济政策的执行经验来看,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来对经济进行“热启动”能够较快见成效。而上半年的经济表现的的确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应当看到,政府的外部输血并不能真正促进内生复苏动力的提升。表面上,前8个月超过8万亿元的信贷投放可谓轰轰烈烈,但由于信贷投放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各行业和各类企业复苏冷热不均。大企业在商业银行的“垒大户”的政策下表现不错,也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而急需补血的广大中小企业尽管盼来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国六条”,但要想获得实质性的信贷支持并非易事。真正令人担心的还

是民间投资的启动乏力。

中国经济要在全球衰退浪潮中率先上岸,既需要大手笔投资与“国家队”进场,也离不开民营资本特别是中小民营资本的草根性责任担当。而民营企业作为主要就业载体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在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冲击比握有最多社会公共资源的国有企业更直接、更严重。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支持。但真实经济现状告诉我们,民营资本在本轮扩大内需的一系列计划中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因此,在热切期待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亟需积极创造条件,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产业振兴的准入门槛,让其成为经济复苏的星火之源,否则仅仅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单拐杖恐怕很难收到预期效果。

另一方面,鉴于消费不能单方面启动,因此,政府买单的家电下乡以及汽车和家电以旧换新只能起到短期的拉动作用,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各级各地政府与其着重基于政府主导的消费扩大,不如狠下功夫解除量人为出传统深厚的广大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将财政支出倾斜到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事业上,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和相关的制度建设逐步满足经济结构向消费转型的配套条件。以此换来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释放。

外部困难仍将持续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

出口能否企稳回升,直接关系到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由于主要贸易对象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今年以来美欧纷纷调整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适当增加储蓄倾向,导致今年以来中国出口持续萎缩。前7个月,全国出口6271亿美元,下降22%;8月份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2.1%,同上月持平。虽然该指数已连续4个月保持在50%以上,但近期回升势头有些疲弱,显示后期走势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尽管IMF乐观预计2010年全球经济增幅可能略低于3%,较7月份预计的2.5%有所提高。而来自美欧和亚洲的8月份制造业数据也显示全球经济的今年增幅可能好于年初的预期。但若依此判断全球经济迈向全面复苏未免过早。实际上,衡量经济是否回暖的就业数据依然比较难看。尽管美国7月份的失业率15个月来首次出现下降,但仍高达9.4%,不少公司仍在裁员;而来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欧盟的失业数据显然更为悲观,欧盟统计局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7月份失业率进一步升至9.5%,创下1999年5月以来的新高。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也在衰退泥泞中挣扎。预计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恢复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中国出口形势短期内仍难有根本好转,出口下降的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假如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能转负为正,则中国经济将难言真正复苏。

既要刺激更应治病

从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中国今年完成保八的任务并不难。但是谁都知道,经济复苏与经济增长并非只有交集。中国需要的不仅是修复性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以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复苏。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增长的。笔者一点也不怀疑,假如三季度经济数据不是很好看,那么各地势必采取更大规模的投资行动,届时8%的增长底线相信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至于由此带来的经济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加深,则未必在各地政府的考虑之中。

因此,宏观经济的下一步既要着眼于保增长的策略性选择,更要积极创造有利于经济持续复苏的内外部条件。一定要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有效的执行力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争取早日实现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的突破,激活民间投资,加大对社保、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彻底摒弃资源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期将经济的增长的下一个周期建立在结构均衡的逻辑起点上。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焦点评论

我们也需要一个“逃税大王”榜单

吴睿鸫

日前,美国国税局要求瑞士银行提供涉嫌逃税人员的账户信息,让大批利用海外账户逃税的美国富人如坐针毡。而早在这之前,美国就有不少逃税者落网法网。

美国媒体日前评出了该国历史上十大“逃税大王”。这种做法很有创意,每个逃税大王的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吸引人,而且用以案说法的方式,来给全体民众来进行税法教育,这种普法方式,不但公众乐于接受,而且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国内,尽管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税务杂志社每年都会举办一届纳税500强榜单,但国家权威部门和媒体,却很少评选逃税榜单。因此,笔者觉得,不妨借鉴美国媒体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搞一个“逃税大王”榜单,可以像“纳税500强”一样,每年定期公布,让全体中国人都知道。这样做意义非同寻常。

首先,能营造良好的纳税环境。倘若有一张“逃税大王”榜单问世,让“逃税大王”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这样纳税环境影响下,哪怕是一些名人富商,出现偷逃税的概率,也势必会大大降低。

其次,会让“疲软”的税收法律硬起来。《刑法》第201条对偷税有明确规定,可是,自收征管法实施以来,因为偷逃税而坐牢的可谓凤毛麟角。现在,如果国内搞出十大“逃税大王”后,也像美国那样,按照现行法律,对当事人进行严厉问责,该补缴税款的补缴税款,该判刑的进行判刑,这不仅能挽回国家税款损失,更为重要的是,也能使国内疲软的税法“硬”起来。

此外,还能堵住制度上的“管涌”。其实,在我国,工薪阶层一直是个人所得税的“主力军”,一些多元化的高收入者,却长期与个税无缘。我想,最主要的因素是制度管理上有漏洞,譬如,个税征管体制不完善、监管模式滞后等。如果国内每年都评选一次“逃税大王”,那么,也会倒逼税务部门站在税法执法公正公平的层面上,来修补制度漏洞,及时堵住税收征管上的漏洞。

实话实说

财经漫画

股指七连阳



水务回归公益,产权分离是关键

周子勋

近日,围绕“水改”的话题成为市场的热门话题。日前,一位接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人士透露,住建部城建司和相关行业协会正在拟定新的“水改”思路,目前还没有成文,不过指导思路是解决“溢价”问题、推行水务资产出让方式的改革。而此前国家发改委、中国价格协会在大连组织了“城市供水价格管理政策暨水价改革培训班”。

在笔者看来,关于水务市场改革的讨论,住建部在相隔一个月之内连着两次,如此高密集的研究部署,已经显示出我国新一轮的水务改革已经启动,水务资产的出让方式将得到解决。自从前段时间各大城市的水价上涨遭到社会各界普遍的质疑后,水务市场改革实际上已经走到了新的关键路口,而社会以及业内人士针对前期溢价收购的质疑,也显示了水务改革将回归公益。

自2002年以来,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水务改革模式,将水务行业和服务与一

般竞争性行业混为一谈。地方政府都以卖水务资产和国有股权为改革主要方式,而由于特许经营制度不完善和企业对地方政府不信任,最终也导致了拥有部分水务公司资产或股权成了特许经营的前提。

从国家确立今后逐步退出水务行业之后,地方政府为了将水务产业这个包袱全面的通过市场消化,各地纷纷引进战略投资者,尤其是国际战略投资,通过这些政策,地方政府不仅将长期亏损的企业脱手,而且还通过转卖的方式获得了不少的财政收入,同时还将过去理应由政府负责的公共职能也被市场化了。

在近几年蜂拥而至的高溢价转让水务资产大戏中,部分外资企业的高调地充当了推手一角,本来水权经营项目可卖两个亿,结果却要卖10个亿。但殊不知,投入是要计算在产出里的,于是一些前年高溢价转让水务资产的城市,

成了本轮水价上涨的急先锋。事实上涨价的背后是各方利益的集中博弈,其中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责任却成为此次涨价的一个最大的失职。无论是外资水务还是国有的水务企业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由此可见,水务改革不能一味的只讲市场化,而把供水的公共服务职能随着市场化转移。无论谁来经营水务,水的公共产品属性是笃定的。公共产品必然带有公权市场的垄断性。“特许经营”不能走完全市场路线,需要以合理利润率来回应消费的公益性与投资的稳定性。

水资源短缺的现实给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居民饮用水的保障问题,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利益,居民的饮水质量,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些实际的问题对于每一个决策者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供水作为一个具有明显公益性行业必须坚持国有化的模式,同时积极吸引社会资

财经时评

时报在线 博客选萃

谁该为投资者教育多“出血”

大山

“独角戏”,市场主体功夫不够,有些甚至是应付了事。而作为市场的最大受益者不参与到投资者教育活动中来,显然是说不过去。

我认为,国家应该强制性规定,证券市场的参与主体每年必须从利润总额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投资者教育。投资者教育活动应该丰富多彩,要有实际效果。监管部门应该把投资者教育作为考核证券市场参与主体的一项重要内容,投资者教育不过关的机构不得开展相关的业务。这样,市场主体才舍得花本钱搞好投资者教育。

随着金融市场越来越高度发达,金融产品越来越丰富复杂,为了降低监管成本,投资者教育显得越来越重要。投资者教育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际潮流,我国证券监管部门近年来也把投资者教育作为监管工作的重要之重。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效果不甚理想,投资者因缺乏金融基本常识导致亏损或上当受骗而找政府麻烦的事情常有发生。可见,投资者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者教育主要是监管部门唱红脸。

总之,让市场参与主体多出点“血”,投资者教育是可以搞好的。

请将央企人才标准告诉国民

周义兴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上表示,国企的薪酬体系像民企一样也是留住人才的主因,所以央企高管总薪酬每年增长4600万左右是合情合理的。他表示,管理央企是向民企学习的,民企的老板不管别的事,一是人要管住,二是账本要管住。

对此,应该承认,在理论上不论国企还是民企,人才——也就是企业家,的确是影响企业市场生存与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因素。但同时要强调的是,如果脱离了应有的人才选拔机制与标准,以及相关企业所处的市场具体地位,对人才的评判结果就完全可能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其实,众所周知的是,现有的国企高管人员、特别是央企高管人员的选拔来说,采用的并不是已为市场经济发展所证明的“经理人制”,而是行政任命制。也就是说,目前央企高管人员在市场是以一个商人面目出现,而在体制内却又是一个官员。由于官员与企业高管人员的选拔机制与

以央企的财产性质讲,既然央企财产属于全体国民所有,那国民就理应是央企的主人,而且在管理体制上还应当有相应的具体体现。可在此问题上,就是暂且对大多央企在享受市场垄断与政策照顾的同时只上缴不超过10%利润是否合理不谈,而仅就李荣融上述的央企薪酬增长的“合情合理”所讲,想一个既不向社会公开、也不让全体国民知晓的央企高管选拔标准,其所有的薪酬合情合理性究竟体现在哪里?

国民的主人身份又如何体现?

笔者认为,如果国资委真想让社会理解央企高管薪酬的合理性,那就必须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首先要向社会公开央企高管选拔标准,二是要让央企的主人,也就是全体国民知情、参与、监督与评判。

真不必督促投资者创业板开户吗?

胡学文

对于创业板开户遇冷,有关方面最近有点着急。有人日前撰文认为,没有必要督促投资者创业板开户,在他看来,投资者不必急于创业板开户。

笔者读罢此人的大作,有几点看法与之不同。根据统计,创业板开户工作自7月15日启动以来,至8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内,创业板的总开户仅为90万户。而据笔者从权威渠道了解到,剔除所有的不合格账户,两市满足适当性管理要求的账户大概在5000多万左右,如此算来,目前的开户率实在低得可怜。

如此一来,有关方面的心情也就可以理解了。至于有文章说没有必要督促投资者开户的说法,笔者窃以为不妥。因为创业板是否有生命力,上市企业的交投活跃与否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创业板千呼万唤始出来,呱呱坠地之际,是需要人们细心呵护的。

当然,文章所说的也有道理,券商在推进开户工作过程中,要注意不要拿“现在不开户可能将错过投资机会”来引诱投资者和误导投资者。但温馨提醒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与“打扰”又另当别论。

目前全球其他创业板或是二板市场,基本上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包括东京、新加坡、香港在内,创业板的交投远远不如预期。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避免重蹈它们的尴尬。

笔者以为,要保证创业板交投活跃,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

(整理 胡不归)